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古今

論衡

23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古今

論衡

23



主編
陳熙遠

編輯委員
李建民 李宗焜 陳維鈞

編輯助理
黎瑞春 陳淑梅 謝仁晏

古今

論衡

【半年刊】

第二十三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編輯小組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ISSN 1561-0594

中華民國一〇〇年十二月出版

定價 新臺幣 180 元

翻印須徵得本刊同意

美術構成：黎瑞春

封面設計：魏吉玉

印刷者：惠文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商：四分溪書坊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本刊已加入「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聯合百科電子資料庫——PDF 全文檢索定位系統」、「TAO：Taiwan Academic Online 臺灣學術線上」。

目錄

新學術之路

- | | | |
|----|-----|----------------------|
| 3 | 王汎森 | 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 |
| 19 | 王世民 | 夏竦與史語所——《夏竦日記》有關記載述評 |

研究專論

- | | | |
|-----|-----|----------------------------------|
| 45 | 王炳華 | 羅布淖爾考古與樓蘭——鄯善史研究 |
| 69 | 沈衛榮 | 《大乘要道密集》與西夏、元、明三代藏傳密教史研究 |
| 91 | 彭國翔 | 姜希轍及其《理學錄》考論 |
| 131 | 李宗焜 | 牛運震《論語注》與《論語隨筆》初探 |
| 143 | 李貞德 | 宣教影片中的疾病、醫療與文化——以《趁著白日：孫理蓮的臺灣》為例 |

研究討論

- | | | |
|-----|-----|--------------|
| 173 | 杜家驥 | 清初內務府設立的時間問題 |
|-----|-----|--------------|

文獻輯存

- | | | |
|-----|-----|-------------------------------|
| 179 | 劉錚雲 | 簡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臺灣史料彙編》 |
|-----|-----|-------------------------------|

師承與交誼

- | | | |
|-----|-----|-----------------|
| 191 | 傅萬里 | 傅拓篆刻名家周希丁與先父傅大卣 |
| 201 | | 編後語 |

目錄

新學術之路

- | | | |
|----|-----|----------------------|
| 3 | 王汎森 | 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 |
| 19 | 王世民 | 夏鼐與史語所——《夏鼐日記》有關記載述評 |

研究專論

- | | | |
|-----|-----|----------------------------------|
| 45 | 王炳華 | 羅布淖爾考古與樓蘭——鄯善史研究 |
| 69 | 沈衛榮 | 《大乘要道密集》與西夏、元、明三代藏傳密教史研究 |
| 91 | 彭國翔 | 姜希轍及其《理學錄》考論 |
| 131 | 李宗焜 | 牛運震《論語注》與《論語隨筆》初探 |
| 143 | 李貞德 | 宣教影片中的疾病、醫療與文化——以《趁著白日：孫理蓮的臺灣》為例 |

研究討論

- | | | |
|-----|-----|--------------|
| 173 | 杜家驥 | 清初內務府設立的時間問題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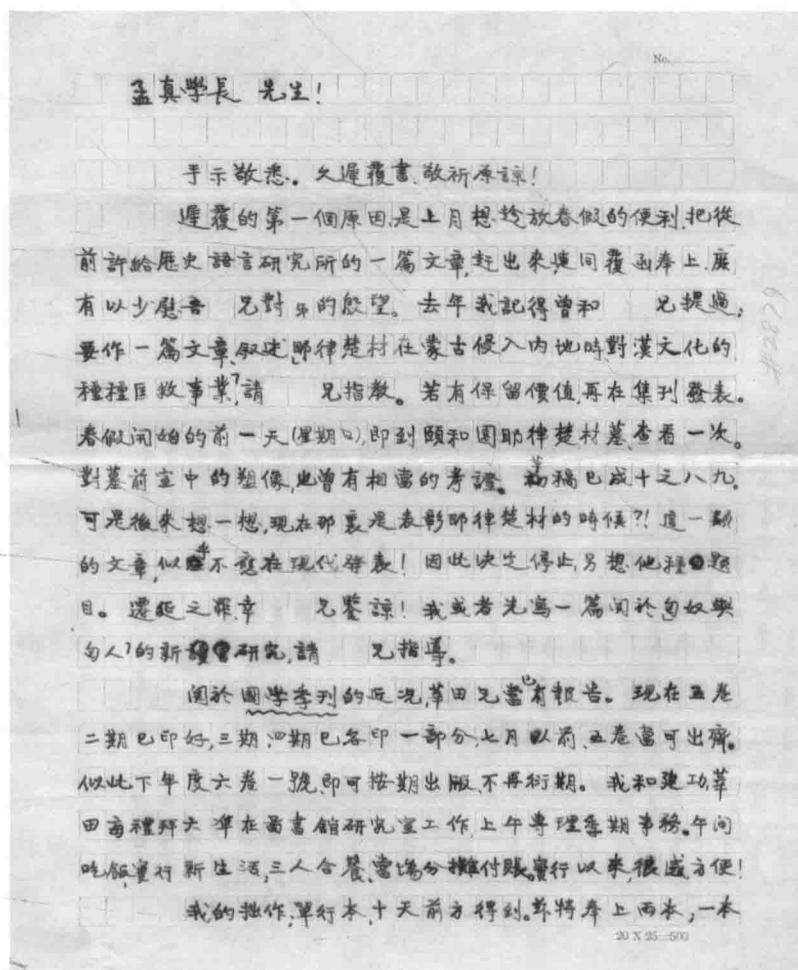
文獻輯存

- | | | |
|-----|-----|-------------------------------|
| 179 | 劉錚雲 | 簡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臺灣史料彙編》 |
|-----|-----|-------------------------------|

師承與交誼

- | | | |
|-----|-----|-----------------|
| 191 | 傅萬里 | 傅拓篆刻名家周希丁與先父傅大卣 |
| 201 | | 編後語 |

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姚從吾致傅斯年函〉，《傅斯年檔案》II：345-1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古今論衡 第23期 2011.12

韋伯說人是尋求「意義」的動物，又說人是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的動物。「意義」對於人有如此之重要性，學者也不例外，許多科學家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為自己的研究工作找到一種意義。愛因斯坦說他的學術工作是為了尋找真理，這是一種「意義」；而居里夫人則認為她的工作是為了造福社會，所以她發現鐳之後並不申請專利，這也是一種「意義」。前後兩種「意義」固有所別，然其為「意義」則一。

許多史學工作者也不可避免地要面臨「意義」的問題。「意義」千殊萬別，但尋求「意義」之動機，恐怕是不能全免除的。一旦牽涉到「意義」，歷史著作便不可能不與史家個人的關懷及時代完全隔絕。

一九七三年，余英時先生在香港新亞書院作「史學、史家與時代」的演講，他提出了這個帶有長遠意義的論題，作了一場膾炙人口的演講。在余先生的演講中，史家、史學與時代的關係，基本上在前期是以蘭克學派及受其影響之各國史家為例，他們認為至少在理想上，有可以完全客觀還原歷史真相的可能（what really had happened），而且在談及史家或時代時，基本上採取防禦的態度（「捍禦之使不能入」），或多或少認為兩者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拉鋸戰，像宋明理學在討論天理與人欲的關係一樣，彼進一尺則此退一尺，此進一尺則彼退一尺。余先生指出，即使如此，他們的史學往往也不自覺地反映了時代的關懷。

余先生說，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說他讀一本歷史著作，往往只要讀上前二十頁，就能明白作者個人的觀點。包括蘭克本人也不是完全客觀的人，閱讀他的書就會發現，蘭克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即反映了他的保守心態。蘭克為日耳曼人，因此特別關心日耳曼國族的歷史發展。可見即使是希望盡量保持客觀以還原歷史的史家，仍然無法完全做到。至於在英國，像愛德華·卡爾（Edward H. Carr, 1892-1982）認為歷史是過去與現在不間斷的對話；^①在美國，像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 Beard, 1874-1948）等人對史學客觀性的挑戰，都是顯例。余先生在演講中並舉了一些中國史的例子，他指出王國維〈殷周制度論〉及郭沫若的《十批判書》等名著如何受史家現實關懷的強烈影響。^②

* 本文是二〇〇七年三月，我在國立成功大學「法鼓人文講座」的講稿，原題是〈再論史家與時代——以「史學二陳」為例〉。

① E.H.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1), p. 35.

② 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收入氏著，《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頁247-270。

現在離余先生一九七三年的演講已有三十多年，三十年前史學界的主流理論與三十年後有所不同。三十年前史學客觀性是主流，三十年後後現代主義當令出現許多極端的看法，譬如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曾經說過「我所寫的歷史都是當前的歷史，我的歷史著作就像爆竹，等他發揮現代的作用，就消失了」，或是說「所有的對歷史文獻的解讀都是誤讀」，^③很難找到歷史中真正的意涵，沒有作者，作者已經死亡，作者看起來好像存在，其實不存在。在此史學思潮之下，史家、時代與著作的關係與過去不同；現在似乎只剩下時代，沒有史學、沒有作者。

不過，經過後現代主義洗禮之後，對了解「史學」、「史家」與「時代」這個三元問題似乎有一些新的視角。後現代主義分析時代與作品，把史學家書寫的過程，史家和時代的作用，所有我們隱而不察的種種，毫不留情地揭露出來，追問到底。所以在分析「史學」、「史家」與「時代」這三角關係時，後現代主義對「敘事」（narrative）、「情節化過程」（emplotment）的分析，便有助於我們從一個更敏銳的角度去理解史家的寫作過程中，爲了權力策略或是爲了呼應時代與現實，所進行的種種工作。

不過我並不想在這裡多談後現代情境下的歷史問題，我想把問題倒轉過來。過去討論史學、史家與時代時，史家與時代代表的是主觀的、隨時流轉的不確定因素，在建構客觀的歷史著作時，它們是非常有害的。這種情形確實經常發生，尤其看多了過去半世紀中共「以論代史」的歷史研究之後，對於「史隨事變」、「史隨術變」，更興起無限的戒心。不過此處要說的是，我們當然應該以古鑑今，用歷史來幫助我們理解與應付時代與世變。但如果我們細心閱讀一些膾炙人口的歷史著作，往往會反過來發現時代與史家的經歷提供了一雙獨特的眼睛，幫助人們看到過去視而不見的現象、或是開顯了過去不識其曲折意義的歷史面相。

所以我在這裡要突出強調的是，「史家」、「時代」與「史學」之間，不總是你死我活的拉鋸戰。我想舉例說明，對時代處境的關懷以及史家的生活經驗，如何幫助他們把握另一層次的歷史事實；過去與現代的對話不見得一定破壞史學的客觀性，主觀的生活經驗不全然破壞客觀性的重建；它們有時候幫助史家將手電筒照到一些原先忽略或視而不見的角落或層面。借用伽達瑪（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的話

③ 參閱黃進興《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一書中討論傅柯的部分；見氏著，《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臺北：三民書局，2006）。

說，這是「視域的溶合」(fusion of horizons)。在這些情況下，史家主觀的思想與意志，與客觀的歷史建構趨於一致，不必為了傳達自己想對時代發出的訊息而扭曲手中的歷史，主觀與客觀合而為一。

此處必須強調，我充分了解過度的現在心態(present-minded)對歷史客觀性的破壞，我也充分了解過度強調伽達瑪「視域的溶合」或是李科特的理論，都可能帶來極端的歷史相對主義。此處我所講的是一種在儘可能想重建客觀史實的前提下、具有分寸感的實踐。用中國話來說，這種歷史實踐或許可以稱為「二義」：它同時是主觀的、也是客觀的。

陳寅恪曾說，「詩若不是有兩個意思，便不是好詩」，^④我的解讀是：好的詩有「二義」，一是詩本身之義，一是作者所寄寓於其間的時代之關懷。歷史研究也常不可避免的有「二義」，一是所研究之史事，一是作者的生命經驗與時代之關懷。此「二義」是兩者同時存在或互相依存。

史家的「二義」性表現在各式各樣的史學實踐中，第一要談到「時代之眼」(period's eye)^⑤與選題。在紛紜無限的「過去」中，為什麼要選取某一個主題進行研究，將之寫成「歷史」？「選取」本身是一件意義非常繁複的行動(德國社會學家盧曼[Niklas Luhmann, 1927-1998]對「選取」有相當深入的分析)。

「選取」的另一面的歷史被刻意遺忘，雖然不必然與時代有關，但是無可否認的，常常有著時代的影子。在「選」與「不選」的時候，主觀的判斷與客觀的歷史便形成某種同一性。在某些特定時刻，古今歷史的彷彿性變得異常明顯，論述歷史與論述當代往往被等同起來。譬如姚從吾(1894-1970)在日本侵略華北期間曾進行關於耶律楚材的研究，闡發「耶律楚材在蒙古侵入內地時對漢文化的種種匡救事業」；可是他給傅斯年(1896-1950)的信中說，因為怕給人鼓勵日本侵略者的聯想，所以當時不準備發表。^⑥

在爭論抗日或不抗日時，蔣廷黻寫了〈琦善與鴉片戰爭〉，認為在鴉片戰爭時，琦善等被攻擊為主和議的人未必是錯，而主戰派未必可取。儘管蔣廷黻的文章寫得相當忠實，但他一旦選擇了這個題目，則主觀的價值判斷與客觀歷史便形成了同一性。此文一出，馬上引起極大爭論，人們很快把琦善與蔣介石化為一人，而蔣廷黻的主觀

④ 黃萱，〈懷念陳寅恪教授——在十四年工作中的點滴回憶〉，收入張杰、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35。

⑤ 在這裡我借用藝術史家 Ernst Gombrich (1909-2001) 的詞彙。

⑥ 〈姚從吾致傅斯年函〉(1935.5.3)，《傅斯年檔案》(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II：345-1。

No. _____

孟真學長 先生！

手示敬悉。久遲覆書，敬祈原諒！

遲覆的第一個原因是上月想趁放春假的便利，把從前許給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一篇文章，趕出來連同覆函奉上，庶有以少慰吾兄對弟的殷望。去年我記得曾和兄提過，要作一篇文章，敘述耶律楚材在蒙古侵入內地時對漢文化的種種匡救事業，請兄指教。若有保留價值，再在集刊發表。春假開始的前一天（星期日），即到頤和園耶律楚材墓查看一次。對墓前室中的塑像，也曾有相當的考證。初稿已成十之八九。可是後來想一想，現在那裏是表彰耶律楚材的時候？！這一類的文章，似不應在現代發表！因此決定停止另想他種題目。遷延之罪，幸兄鑒諒！我或者先寫一篇關於匈奴與匈奴人的新發見研究，請兄指導。

關於國學季刊的近況，華田兄當有報告。現在五卷二期已印好，三期、四期已各印一部分，七月以前，五卷當可出齊。似此下年度六卷一號即可按期出版，不再衍期。我和建功、華田每禮拜六準在圖書館研究室工作，上午專理季期事務，午間吃飯實行新生活，三人合餐，當場分攤付賬。實行以來，很感方便！

我的拙作，單行本，十天前方得到。茲特奉上兩本，一本

20 X 25 - 500

圖一之1：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姚從吾致傅斯年函〉，《傅斯年檔案》II：345-1。

No.

送兄，表示敬意，一本請兄暇時隨手批正，便中賜還，以便改正。

母校上課如恆。且隋唐五代史隨之先生已開始授課。史學系四年級同學畢業論文，已交大半。弟已收到八本，大致還算內容充實。有幾本我很得意。（樂煥兄作一篇宋人使遼語錄與行程考，很好。）你是很關心北大史學系同學們的工作的，故隨便報告幾句。

祝你工作中一切如意！並
伯母及嫂夫人萬好！

弟從吾敬啟

五月三日。北平。

聽說你快來北平了，甚之欣幸！我近來又到琉璃廠兩次。一次替北平圖書館買了半部三閩高說。（原本六十塊錢）經過的情形是這樣的。那一天我在文芸閣遇到一位德國朋友，Dr. W. Fuchs，談起高說，他說他曾看見一部三閩高說，不知道好不好。不過高說刻的很精緻。我拿到手裏一看，字類明中葉的官板，是一部罕見的書。可惜三閩只有偏閩，又沒有刻成年月。索價八十元。我回來給趙斐雲一信，一週後得到回信，說已化六十元買下了。北平好東西還多。工作之餘還請多來盤踞。不但我們可得些鼓勵，也可多買些好書呵！

20 X 25—500 從吾敬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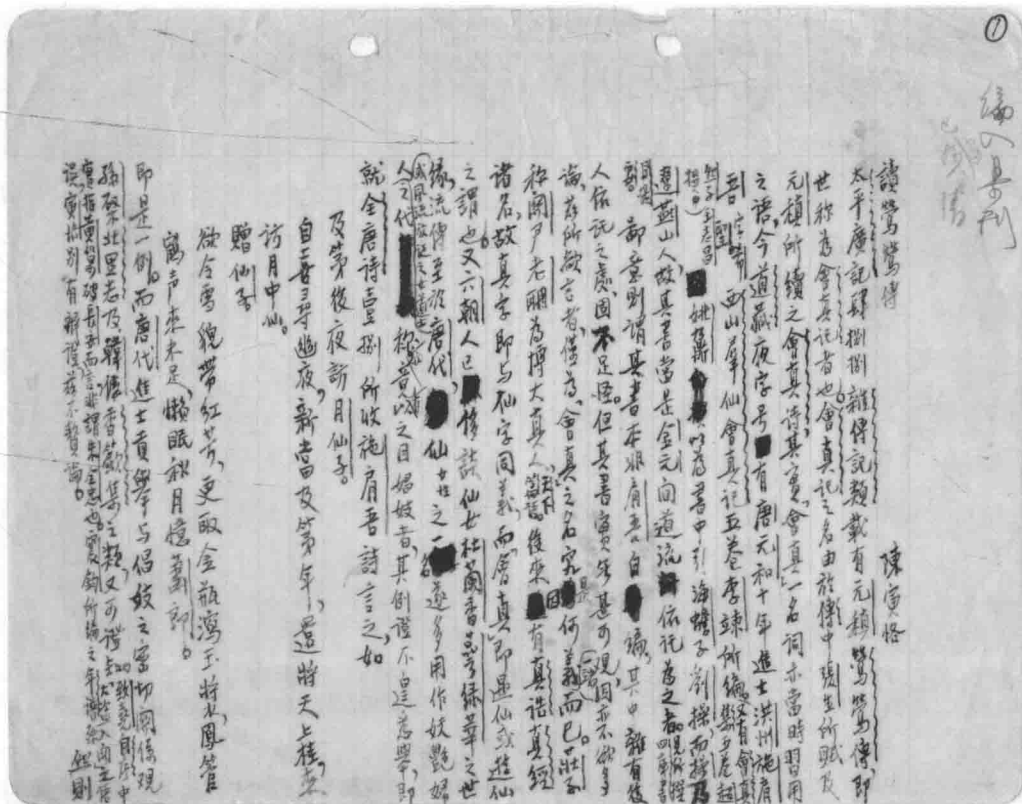
圖一之2：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姚從吾致傅斯年函〉，《傅斯年檔案》II：345-1。

與他的研究也形成了同一性。過去琦善一直被視為是誤國的奸臣，他與鴉片戰爭的問題，人們大多不屑於進行嚴肅的史學研究；經過蔣廷黻這一研究，不管人們贊成與否，至少使得琦善這一部份的歷史變得清楚起來。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時代的關懷、史家個人的價值判斷，可能幫助人們照見過去不為人重視的歷史陰暗角落，既是時代的、也是史家的、同時也是史學的，三者套疊在一起。這種「套疊」、而不是拉鋸式的關係，也是一種「二義」的現象。

說到這裡，我要跳出正題，講一點其他的事。

大概在二〇〇六年或二〇〇七年初，我曾經收到香港一位外國古董商的電子郵件，說有一批陳寅恪的遺稿待售，他們多方打聽之後，認為史語所可能會感到興趣，並且附上一份目錄。我粗閱一下，發現大部分是陳寅恪先生已發表文章的草稿或助手代謄的抄件、學習語文的筆記、還有中山大學歷史系的開會通知單，史料價值不如想像的高，加上對方索價極高，所以我們最後謝絕了。

但是正因為這個偶然的事件，我請史語所的傅斯年圖書館找出一些陳寅恪當年發表在《史語所集刊》的原稿。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讀鶯鶯傳〉，這篇短文後來收入



圖二：陳寅恪〈讀鶯鶯傳〉手稿，《史語所檔案》雜 31-3，頁 1。（傅斯年圖書館藏）

《元白詩箋證稿》，是我相當熟悉的著作。不過這次初讀原稿，^⑦最搶眼的仍然是他講到在道德習俗強烈變動的時代，具有才能卻不守禮法之人，如何巧妙應用新舊兩種道德標準為自己循環取利的現象。他講元稹與崔鶯鶯的關係時說：

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巧拙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⑧

這一段話常被引用，大家恐怕也都知道，在兩種以上道德或習俗標準之間循環取利的現象，事實上即發生在陳寅恪所熟悉的晚清民國這一階段，尤其是「其賢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也一定是陳寅恪當時日常生活中見到太多這一類的例子，所以對這個現象了解得特別深刻，形成他解析元稹行為模式的基礎，而這正是陳寅恪善用「時代之眼」的收穫，即一方面是史學研究本身之義，另一方面是史家寄寓於其間的時代感懷。

陳寅恪與王國維對兩種以上的標準之間循環取利的現象都一樣敏感，而且也一樣鄙視。我忘了誰曾回憶說，王國維之所以始終帶瓜皮帽、作清遺民，未必是因為他如何地愛戴清廷，主要是因為他看不起一批在辛亥革命前後行為不一致、變得太快、藉以弋獲個人利益的人。恐怕也因為這種敏感性，使得他在〈殷周制度論〉中論及殷周兩朝的更迭之時的隱微曲折之處，也有不少神來之筆。

陳寅恪每好用「知人論世」為學，這是「二義」的另一種表示。譬如中日戰爭期間他在淪陷的香港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因為現實的境遇，而更懂得宋代首都淪陷的實況。我猜這正像是在顯微鏡下看切片，把焦距調到一個合適的情況，眼前的一切突然清楚起來。又如他在〈論再生緣〉中說「年來讀史，於知人論世之旨轉有所得」；反過來說，也可能是「年來歷世，於史籍中人世隱微之處，轉有所得」。這兩者是往復循環、互相影響、不可分割。

我的淺見以為，「知人論世之旨」不是泛語，而是一個重點，它使得陳寅恪的不少歷史著作帶有一種三稜鏡的特質，「時代」、「史學」、「史家」三者套疊在一起。

⑦ 這次初讀原稿，同時又見到原稿後面的附信，大概是寅恪先生將原稿寄到所裡之後，對其中一段感到不安，所以希望所中同仁代從承印的商務印書館抽回刪去；為了怕商務偷懶不肯照辦，信中還交代了一些具體策略，可以看出其為文及思考人事之細密慎重。

⑧ 陳寅恪，〈艷詩及悼亡詩〉，《陳寅恪先生文集三·元白詩箋證稿》（臺北：里仁書局，1981），頁82。

Notes on Yuan Chên's poems
by Chên Yin-kè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稿紙成種

元微之悼亡詩及艷詩箋證（元白詩箋證之一）

陳寅恪

元氏長慶集卷拾叙詩奇樂天書云：

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以于敬化者，近世婦人量淡眉目，綰約頭髮，衣服脩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剽怪艷，因為艷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

寅恪案，今存元氏長慶集為不完殘本，其常玖卷中夜閑正夢成之等詩，皆為悼亡詩。韋穀才調集第五卷所錄微之詩五十七首，雖非為一人而詠，但所謂艷詩者，大抵在其中也。微之自編詩集，以悼亡詩與今古兩體之艷詩分歸兩類，其悼亡詩即為元配韋叢而作，其艷詩則多為其少日之情人所謂崔鶯鶯者而作。微之以絕代之才華，特寫男女生死離別悲歡之情，感其哀艷纏綿，不僅在唐人詩中不可多見，而影響及於後來之文學者尤巨。如鶯鶯傳者，初本微之文集，中附庸小說，其後竟演變流傳成為戲曲中之大國鉅製，即是其例。夫此二婦人與微之之關係，既須先後比較觀察之，則微之之此兩類詩，亦不得不視同一類，相按並論也。

夫此兩體詩本為男女夫婦而作，故於一當日社會風習道德觀念，二微之本身及其家族在當日社會中所處之地位，三當日風習道德二事影響及於微之之行為者，必先明其梗概，然後始可瞭解。寅恪前著讀鶯鶯傳一文已論及之，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拾本第貳分。雖可取而並觀，然為通曉元氏此兩類詩故，不憚重複煩悉之譏，仍為一總括序論於此，以供讀此兩類詩者之參考焉。

圖三：陳寅恪〈元微之悼亡詩及艷詩箋證（元白詩箋證稿之一）〉手稿，《史語所檔案》雜3-2，頁1。
（傅斯年圖書館藏）

陳寅恪在〈論再生緣〉中以同情的角度看到種種過去的人所讀而不知的曲折，尤其是「則知端生心中於吾國當日奉爲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皆欲藉此等描寫以摧破之也」，⁹如果不是生在近代婦女解放思潮的時代，而自己又親歷婦女解放之實境，恐怕也不易有前述的見解。

接著我想以對〈論韓愈〉一文的討論，來爲陳寅恪的部分作結。我一直到最近才有機會詳閱《吳宓日記續編》，這是我早想讀的一部書，不過它到二〇〇六年才出版。¹⁰吳宓在一九六一年千里迢迢地由四川跑到廣州見陳寅恪一節，早已是膾炙人口的佳話，所以我推測日記續編中對這一時期陳寅恪的思想狀態必定有詳細的記載。果然不出所料，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一日之間兩人的談話中，陳寅恪顯示出他對中共領導層宣佈向蘇聯一面倒表示極大的不滿，他認爲當時中國應該作美、蘇以外第三勢力（如印尼等國）之領袖，另一方面認爲任何一個民族應堅守其獨立性及自主性，絕無向任何其他國家一面倒之道理。¹¹吳宓指明陳寅恪當時所寫〈論韓愈〉一文標舉韓愈之歷史地位時，特別提到「韓愈辟佛，實取其保衛中國固有之社會制度，其所辟者印度佛教之『出家』生活耳」，即是有感於向蘇聯一面倒而發。¹²〈論韓愈〉一文是大家所熟悉的，經過《吳宓日記》的幫助，我才憬悟這篇短文中投射了一種特殊的時代關懷，同時我也推測陳氏爲文時因爲受到時代環境的促發，而對韓愈在固守本位文化方面的貢獻才特別突出加以闡發，這也是一種「二義」性。

陳垣一向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所以我接著要以陳垣的《通鑑胡注表微》爲例。一九五〇年初，陳垣在給老友的一封信中講他史學思想的幾次變化：

九一八以前，爲同學講嘉定錢氏之學；九一八以後，世變日亟，乃改顧氏《日知錄》，注意事功，以爲經世之學在是矣。北京淪陷後，北方士氣萎靡，乃講全謝山之學以振之。謝山排斥降人，激發故國思想。所有《輯覆》、《佛考》、《道考》、《諍記》、《表微》等，皆此時作品，以爲報國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數十萬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據，皆托詞，其實斥漢奸、斥日寇、責當政耳。¹³

我覺得這段話中「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據，皆托詞，其實斥漢奸、斥日寇、責當政耳」是言過其詞，即使到了今天人們仍把《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

⁹ 陳寅恪，〈論再生緣〉，《陳寅恪先生文集一·寒柳堂集》（臺北：里仁書局，1981），頁59。

¹⁰ 吳宓，《吳宓日記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¹¹ 同上書，第五冊，頁160-163。

¹² 同上書，第五冊，頁163。

¹³ 劉乃和等著，《陳垣年譜配圖長編》（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頁546。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及《通鑑胡注表微》當作嚴肅的史學著作看，沒有什麼人認為它們只是表達時代關懷的「託詞」。比較恰當的說法是：它們既表達時代的處境、史家的關懷，同時也發掘了歷史的事象，三者「套疊」在一起，如果只視為「託詞」，則未免是對上述研究工作的一種貶損。

以上幾種書皆作於中日戰爭時期。《清初僧諍記》中講「法門中故國派與新潮派之間的矛盾」，藉抨擊變節僧人以影射在淪陷區中媚事新朝之漢奸；《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認為河北三教皆宋之遺民，表彰他們藉宗教以維持民族情懷之情形，¹⁴ 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此處只想從另一方面來說，時代處境及生活經歷也幫助了陳垣映照出過去不為人所重視的歷史，並揭顯出前人所未觸及的複雜層面。不過以《通鑑胡注表微》一書為例，陳垣想藉它揭顯淪陷區中之民族大義，但是時代的演變超過撰史的速度，《表微》尚未出版而日本已投降矣。

陳垣於一九四三年開始寫《表微》，一九四五年完成，前後共花三年時間。他描述當時自己的研究工作是「近又進一步，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¹⁵ 寫《表微》時的陳垣，住在北京日本佔領區，每天觸目所及就是「華」「夷」之別、守節與漢奸、狷介與醜態等，高度對比的世相在生活舞臺中赤裸裸地演出，而他自己也時常必須在種種中間進行抉擇。

陳垣的學生柴德賡在《勵耘書屋問學記》中已經將當日漢奸奔走日人之門的光怪陸離現象，與《明季滇黔佛教考》及《表微》中特定的部分作了比對。¹⁶ 柴德賡說，當時北方漢奸投降派，一種是在政治上失意已久的北洋餘孽，藉依附日本作為東山再起之資；另一種是日本留學生，過去在英美留學生之下忍氣吞聲，現在可以依附於日人勢力之下，一吐抑悶之氣。陳垣寫《明季滇黔佛教考》中之和尚見月讀體，當他的朋友木陳忞作了清朝國師大和尚，路過南京前來看他時，見月對徒弟說，木陳是以國師大和尚的身份來對見月驕傲，真是一錢不值！依柴德賡看，陳垣當時遇到很多類似狀況，故寫見月其實是在寫他自己。書中還寫了清初餘慶縣令鄒秉浩告發錢邦芑，陳垣說「鄒秉浩小官僚，奉命作走狗，可憐人也」，其實是因北京有個小漢奸總是纏著陳垣，陳非常痛恨，常罵他「小官僚」、「走狗」。柴氏又說，陳垣自幼熟讀《通鑑》，對胡注但並無多大感覺。抗戰時讀《通鑑》胡注，讀到「臣妾之辱，唯晉、宋為然，嗚呼痛哉」，才恍然大悟《通鑑》胡注中所隱含的深意。故陳垣常說「我們理解胡三

¹⁴ 同上書，頁455-456。

¹⁵ 同上書，頁482。

¹⁶ 柴德賡，〈陳垣先生的學識〉，收入陳智超編，《勵耘書屋問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增訂本，2006），頁92-99。